

張義祥

個人簡介

1930 年生於上海，祖籍東莞。1937 年上海淪陷，暫住清涼寺收容所，入讀臨時學校。1939 年，遷至大西路營房。1940 年，乘船到香港，入讀永存義學。香港淪陷後，逃回廣東，後轉往廣東兒童教養院。1944 年，隨兒教院撤退至連縣。1945 年，小學畢業。1946 年，回到廣州，後遷居香港，任職培道女子中學。

童年生活

1930 年，我在上海出生，祖籍為廣東東莞。家有父母、兩個哥哥和弟弟。父親十幾歲時，跟堂哥到漢陽兵工廠學師，¹那時中國還有皇帝。漢陽兵工廠是中國近代很重要的兵工廠，父親在那裡工作了很多年。廠裡全是機械工人，他們要四處走，先到河南，再到上海，所以我在上海出生。

對四、五歲的事情，我還有模糊印象。記得我們住在虹口提籃橋，那裡有座提籃橋監獄，關著很多戰犯。我們後來搬到唐山路旁的東有恒路。²1937 年打仗，1940 年我們仍在上海居住。那時我見過很多日本人。吳淞路是他們的聚居地，有很多日本兵站崗。不過當時還沒有開戰，日本人說士兵是用來保護日本領事館和僑民的。

小時候，我有兩次奇妙的經歷。有一次，我牙痛，痛得很厲害，吃止痛藥也不行。我跟媽媽到街市買菜，菜市場有位說廣州話的小販問媽媽：「阿婆，你兒子怎麼整天苦口苦臉的？」母親說：「他牙痛。」小販叫母親下午兩點在家裡等他，到時讓他看看。後來他叫母親買些葡萄樹根來治牙痛，但她不知哪裡有葡萄樹根。小販說葡萄樹葉也可以。於是，母親吩咐舅舅到附近一個叫「大世界」的遊樂場，³摘些葡萄樹葉，再加三、四兩瘦肉來煮湯。我喝了以後，竟然痊癒了。另一次，一個小販拿來一根鐵釘，嘴裡唸唸有詞，把鐵釘釘在門頂上，然後對我說：「你不要摸它啊，一摸你就會牙痛。」那時我約七、八歲，總之依他吩咐去做。以後的十幾年，我真的沒有牙痛。這些事似乎很荒唐，但確是我的親身經歷。

¹ 漢陽兵工廠原名湖北槍炮廠，由張之洞創辦，1892 年動工，1894 年建成。它為晚清設備最先進、規模最大的軍工製造企業。

² 東有恒路即現今上海的東余杭路。

³ 大世界即上海大世界，1917 年由黃楚九創辦的大型機動遊樂場，位於現今西藏南路、延安路交叉口附近。1928 年，由周維基再設計重建。

上海逃難

1937 年 7 月 7 日，日本軍隊在蘆溝橋打響第一槍，8 月 13 日進攻上海，那時父親便告失業。8 月 15 日黃昏，父母帶著我們三個孩子，跨過外白渡橋，⁴進入公共租界。記得離橋不遠處，有一個難民收容站，由空置的舊房改建而成，接收從華界逃過來的難民。我們獲安排在英商太古洋行貨倉住宿一晚，那晚卻發生了不幸事情。那時我睡在貨倉地上，無床無枕，不幸扭傷了頸骨。後來難民所寫了一張紙，讓我去看病。我到了紅十字會，看了跌打。一個多月後，才告痊癒。

在太古洋行貨倉只住了一晚，翌日我們便乘車到三馬路一間休業的酒樓暫住。那酒樓叫會賓樓，其收容站收留了我們一個多月，然後把我們送到新閘路清涼寺。我們在寺裡又住了一年。那裡約有數百個廣東人，他們在清涼寺的空地，搭建了幾座竹棚，收容從會賓樓轉送過來的百多戶人。我們初到時，在寺前一片空置平房暫住。一、兩個月後，竹棚建好，我們才住在那裡。其實當時只要有地方住就可以了，住在哪裡也沒甚麼關係。

1937 年 8 月，入住清涼寺後，我便到臨時學校報名讀書。學校在清涼寺裡，搭棚而建，並不是正規學校。它好像沒有名字，也許有，不過我不知道。那時我只有七歲，是我人生第一次入校讀書。記得一個課室有數十人，當中有十個十歲左右的兒童。學校就只有一個大班，故採用我們今天所說的複式教學。那時師生人數不多，學生按程度分成幾組，老師懂什麼，就教什麼。

上課時，我們有課本，由先生講解。記得課本是政府出版的，其中不少是由中華書局、商務印書館編印的。科目有算術、常識、國文，但沒有英文。學校的女老師較多。此外，學校接收的是廣東同鄉會子弟，故同學多為廣東人，老師上課亦說廣東話，當然間或有說上海話的。

我在這所學校讀了不足一年，後來日本人打來，轟炸上海。我住在三馬路的廣東同鄉會，先施公司就在大馬路，⁵旁邊是二馬路，接著三馬路。有一次，記得是白天，突然一聲巨響，原來先施公司門口被掉下一個五百磅的炸彈，炸死了很多人。當時我站在難民所裡，整個人被拋起來，再掉在地上。五百磅炸彈的爆炸威力，真是厲害！聽說那個炸彈是中國軍隊在空

⁴ 上海外白渡橋位於蘇州河與黃浦江交界處，乃連接黃浦與虹口的重要交通要道。1937 年 8 月淞滬會戰期間，數以千計的上海民眾通過外白渡橋，湧入公共租界。

⁵ 上海先施公司創辦於 1917 年，為國內第一間華資百貨公司，位於上海南京路北側。

中掉下的，不是日本人幹的。聽說有路人被炸彈碎片削去了頭顱，但他仍繼續走路。那次死了很多，傷者亦數以百計，畢竟先施公司那裡非常熱鬧。逃離上海前，我只留在家中，聽到飛機一邊巡邏，一邊用機關槍掃射。有些彈殼掉在地上，有些掉在屋頂上，叮、叮作響。不過那時我懵懵懂懂的，所以也不怎樣害怕。

1939 年，廣東同鄉會把我們移交給政府，我們搬到另一個難民所。政府在大西路的公園提供一些竹織批盪的房子給我們。那裡有十幾個難民營房，收容了不同省份的難民。剛搬進去時，家裡有爸媽和我們兄弟三人。1939 年，爸爸的朋友介紹他到香港工作，他就跑去香港了。

那時上海的公共租界主要是英美聯合的，不過仍有法租界。大西路的難民所因為處於邊緣位置，所以日本人沒有進來。當時我年紀稍大，對難民所生活印象猶深。難民所是單層平房，裡面分成一格格，每一格住一家人，共住了三十多家人。我個子較小，房間相對顯得較大。爸爸走了後，家裡有四人，睡上下鋪床。我沒有甚麼傢俱，只有床，還有一些衣服、碗碟和行李等。難民所下面是山墳，連棺材板也可看見。

政府負責提供難民所的食物，我們每天只吃兩頓。一桶飯分下來，每家人可分得一盤。此外有些青菜、一點油和鹽，但沒有肉。如果有錢，可以自己到外面買肉。我認為那裡生活比清涼寺的好，起碼我們可以吃飽，生活也有規律。我們每人都有一張難民營證，像一個小牌。有了這個牌，就可以進出難民營。難民營只有一個閘口，出入皆須登記。那時我們還小，甚少外出，只有爸爸出去。難民所裡有一座教堂，還有一些偽軍，他們也是廣東人。那些偽軍服裝挺漂亮的，像香港警察制服。

我見過戰機，經歷過空襲，所以從小就對日本人印象不好。離我們家沒多遠就是吳淞路，在打仗前，有很多日本兵在那裡站崗。他們有個像龜殼的盔甲，用來包裹全體。當時我們看的書籍和報紙，都在宣揚抵制日本的信息。我們很抗拒日本人，直到現在，我對他們仍有一些恨意。

在清涼寺的時候，我曾去過謝晉元團長的四行倉庫。⁶雖然謝晉元團長已經撤至香港，不過他們死守四行倉庫的故事，在當時仍很著名。從清涼寺出發，大概走一公里就到四行倉庫。

⁶ 謝晉元，廣東蕉嶺人，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，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軍官。1937 年 10 月 26 日奉命帶領四百多人留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，掩護主力部隊後撤，堅守了四晝夜。

我和哥哥曾特地去那裡憑弔一番。那裡有條蘇州河，英軍駐守一個橋頭，日本人駐守另一個橋頭。經過的時候，若看到日本人，就要向他鞠躬。我去四行倉庫的時候，就見到日本人，不過那時沒有走得很近。倉庫在河邊，我們在河邊逛了一個圈便回來。戰後我在香港當校工，怎知四行倉庫軍人住宿的地方，就在學校附近，即現在土瓜灣真善美村亞皆老街球場。

我也唱過抗戰歌曲，印象最深是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。此外，還有很多流行歌曲，如周璇的歌曲。⁷那時我沒有收音機，偶爾聽到，便停下來聽聽。在清涼寺學校的那一年，老師也教過抗戰歌曲，但我已經忘記，也許那時還小吧。

在大西路的難民所，住了一年多。後來上海市政府接管難民營，計畫盡快結束難民工作。1940 年初，將我們這些廣東籍的難民，集中在公平路待遣所，等待遣送回廣東。那時廣東已經淪陷，於是分批送我們去香港。那時爸爸到香港已經一年多，也找到工作，於是我們便轉到香港。

遣送香港

難民一批一批地遣送走，我們那一批沒多少人，除我們外，頂多還有一家，共十來人。當局先登記我們是何許人，看看有沒有親戚在香港，如有，就安排到香港。大概在 1940 年秋天，我們前往香港。那時既沒有日曆，又沒有手錶，故不記得具體時間。離境時，應該要辦手續，不過不用我去辦，所以印象不深。我們從上海太古碼頭坐「濟南號」到香港，⁸「濟南號」是一艘黑煙囪大船，約有七千噸重。對濟南號印象深刻，是因為我很喜歡研究船隻。看一艘船，就得看它的名字。到香港後，我還能看到濟南號，因為它行走港滬和中國沿岸，如香港到上海、香港到廈門等。只要打開報紙，就可看到濟南號的航程。那時候有很多船期表，資訊相當準確。

記得大家都穿「洗水衫」，⁹故行李不多。那時貨船的頭尾均有單層的船倉，中間也有三層。駕駛艙和員工宿舍在中間，我們睡在載貨的大倉裡。大倉位於船的底層，裡面有空間，放了一些上、下鋪床。當時貨船就是這樣載人了，大家可睡在地板上，也可睡在床上。船上沒有人理會，吃飯時，有人會拿飯給我們吃。

⁷ 周璇，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著名歌影紅星。

⁸ 濟南號，英國太古公司運營的客船。

⁹ 洗水衫為廣東俗語，指經常換洗的衣服。

過了兩天，船到廈門，在那裡卸貨和上貨，花了約四、五天時間。在廈門時，母親跟大哥上岸去，我則留在船上。記得開船時是下午三時。對此有印象深刻，是因為我暈船了，且暈得很厲害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才好一點。中午前，我們終於抵達香港，船程大概為八天。那時入境香港，有一個苛刻條件，就是每人要付四百元港幣。我們就連四十元也沒有，哪有四百元呢？於是，我們唯有通過船上買辦的安排上岸。上碼頭時，我們每人獲派四百元，或是百多元，具體忘記了，總之一家四口起碼共四百元。買辦借錢給我們，過了海關後，便要歸還。我不太清楚那買辦是甚麼身份，總之不是待遣所的。當時待遣所和太古輪船公司合作，把我們遣送到香港，故船票和其他物資均免費。待遣所應該是官方機構，不然那資源不會如此充足。

濟南號停在中環海面，上岸後我們請了一艘小電船，俗稱「嘩啦嘩啦」，載我們去旺角碼頭。我們好像在旺角山東街附近上岸，爸爸就在那裡等我們。那是我第一次來港。爸爸召了一輛車把我們載到荃灣。他在兆和街租了一間板間房。那時荃灣只有一條街，很熱鬧的。爸爸在「九咪半」的「香港鐵管子廠」工作。¹⁰香港淪陷前，我們在那裡大概住了年多。

1941年，我來港的第二年。9月，我在永存義學讀書。那時哥哥去學師，家裡只有我一個人讀書。學校在芙蓉山，即現在圓玄學院附近。當時入讀這所學校，是因為我們窮，知道芙蓉山有義學。「義學」，顧名思義，即實施義務教學的學校，由慈善團體籌辦。學校採用混合式教育，學費為每月三毛錢。學校是全日制的，我們中午回家吃飯，吃完又回去上課。學校只有一間小屋，裡面有兩個課室，即兩個班，一個高年班，一個低年班。當時老師教完這班，便跑去教另一班。我入學時，讀二年級，班上約有四、五十人，有男有女。我們沒有校服穿，上學大抵穿短褲和一件夏威夷款式的襯衫，以及一雙像「白飯魚」的布鞋。¹¹我一直穿布鞋，直到二十一歲才第一次穿皮鞋。學科跟在難民所時學的差不多，只是課本不同。算術科也要學中國商務知識；國語科叫「漢文」，課本分冊印製。除了算術、漢文，還有公民常識和尺牘，但沒有美術和體育。學校沒有正式老師教音樂科，當時只有一位男教員，他甚麼工作都承擔。我記得他笑容很好，為人慈祥。

我對永存義學印象很深的事，因為曾被客家仔追打。那裡叫木棉下村，步行去芙蓉山，要走十五分鐘；我們是外來人，在那裡租了他們客家村的房子住。他們客家仔並非很兇，只是不時用言語挑釁我們，如發噓聲、說你扮傻等。我們聽到只好快走兩步，躲開他們。

¹⁰ 九咪半，即青山公路其中一段路。「香港鐵管子廠」即水喉廠。

¹¹ 白飯魚為廣東俗語，指白布鞋。

1941 年秋天入學，讀了三個月，12 月 8 日香港打仗了，我也開始停學。記得 12 月 8 日那天，早上 8 時左右，我在吃粥，準備上學，突然聽到飛機聲。飛機一面轟炸啟德機場，一面散發傳單，上面寫著「中日聯合、打倒米國」。¹²因為我在上海經歷過，所以知道日本人打來了。後來，日本人進過我家，他們懂一些廣東話，問我們有沒有菜刀：「刀呀，有呀？冇呀？」那時候有大人在家，日本人也沒有像國內時那樣抓女人，只是問問我們。我們回答後，他們就走了，沒有搜家或者破壞。

當時滿街都是日本人，他們隔著那條小水溝，即現在的大河道，在眾安街尾建了一個營房。不知道是辦事處還是甚麼的，我看到有些疑似偷東西的人被關在那裡。有一天，有兩個上海女人在大河道河邊的公共水喉旁洗衣服，那時日本人已經到了昂船洲，突然有個炮彈打到大河道上，炸死了那兩個女人。雖然我沒有親身目睹，但報紙上說有兩個人被炸死了。我從窗口可以看見那個水喉，所以應該曾看到她們。那時我在家中，炮彈射過來時，氣流把我拉到窗邊。後來我不時想起這件往事，偶然也會覺得恐懼。

香港淪陷後，家裡因為窮，面臨生存問題。記得當時原本一元八斤的米，竟然賣兩元四毛一斤。物價高漲，糧食問題很嚴重，連花生渣我也吃過。我們是東莞人，決定回鄉，但當時心態也只是「搏一搏」，畢竟我們沒有田，沒有地，也未曾回過家鄉。我們找日本人登記資料，申請回鄉，他們就發通行證給我們。回鄉途中，如果遇到日本人，就出示通行證。不過，我們沒有遇到日本人，反而遇到很多游擊隊。

歸鄉

1942 年 1 月，我們從荃灣出發，那時沒有車，只得步行。第一天，從青山道走去大埔，在日本人提供的地方住宿，第二天起程再走。日本人在大埔道組織了一個維持會，負責在火車路邊派米，只要有通行證，每人就能領取一斤米。到了深圳，再能領取一次。因為鐵路被破壞了，所以只得步行回鄉。沿途有很多人，扶老攜幼，有些游擊隊在路旁拿著槍，收買路錢。我們多少得給他一點。我們在深圳，住了一晚。第三天，在塘下又停一晚。那裡是游擊區，已經沒有東西派了。父母走得慢，大哥聘請了一個苦力工運送衣物。那人叫我們把行李給他，我們懵懵懂懂地照辦，誰不知道人心險惡！大哥走後，我們跟著他走，那個苦力工卻把我們的行李拿走。那時我們也無可奈何，習慣了吧。從塘下再走一天，就到家鄉橫瀝。我

¹² 米國即美國，日文把美國譯為「アメリカ」，漢字為「亜米利加」，簡稱「米國」。

們住在當年帶父親出身的堂伯父家中，生活很艱難，只能把一勺米磨成飯糊來吃。吃了一個多月，把屋子賣掉，只剩下外殼磚瓦，那些磚瓦又賣得幾百元，全用來買吃的。

後來有人說樟木頭有搶救隊，但又有人警告不要去，說那是騙人當兵的。我們想不要說當兵，就算當賊也要去，因為已經沒飯吃了。於是，我們全家去了。爸爸和大哥在惠州跟我們分開，去了貴陽。其實當時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去哪裡，要到事後才知道。距離樟木頭兩三公里的地方，有條石馬村，當時是前線，搶救隊就駐紮在那裡。那時有人說搶救隊全是一些十多二十歲的小女孩，可能是東江縱隊的，¹³她們搶救一些被日本軍佔領村落附近的小孩。母親帶著我和弟弟走向韶關，到了龍川，搶救隊就把小孩分類。最後，我去連縣的兒教院，母親去韶關五里亭的婦女生產工作隊，弟弟則去樂昌育幼院。我們一家人，就這樣分散在四個地方了。

兒教院第一

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要去兒教院，別人說去就去。到龍川時，改由另一個領隊負責，他是為搶救香港淪陷區兒童而來的。我跟著隊伍，那時候一幫十來歲的小孩，也不清楚自己要去哪裡，到了學校才知道原來去廣東兒教院。我們從龍川到兒教院的那批小孩，有七、八十人，全是香港人。我們從龍川走了三天，到了忠信，在那裡住了差不多一個月，然後有廣東省銀行的木炭車送我們去。兒教院是李漢魂妻子所辦的，所以她調來一輛省行的木炭車，把我們從忠信送到韶關的十里亭。十里亭有一些營房，我們住了幾天，又轉到坪石住了一晚，最後走到星子。那裡就是兒教院第一院的所在地。

當時兒教院分兩類，一是由中央經費資助，就是一、二、三院；而四、五、六、七院就由省負責。我去的是一院，去到那裡才知道它的全名是「中央賑濟委員會廣東兒童教養院」。我們七、八十人住在一個叫「僑童班」的營房。當時我們的學習程度不一，班上有讀中學的，有識字的，也有不識字的，但兒教院沒有區分學生程度，例如台大教授賀凌虛在香港時已經讀到中學，當年也和我們同班。後來獲選到中學去的，大概有十個人，他是其中一員。我是「高不成低不就」，本應進高年班，但那裡學位不足，只好先進低年班，可是能力又比那裡高。兒教院實行四年制，分成一區、二區、三區。我在一區讀了兩、三個月，二區有學位，於是就到了二區，讀了兩個月便考試。暑假後，他們又送我到三區，這樣我在一年內升了三個區。記得當時我在教養院的號碼是 1458——一世不發，真不幸！

¹³ 東江縱隊全稱為「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」，為中國共產黨於抗日戰爭時期領導的一支抗日遊擊隊。

離開香港時，我只穿一雙「白飯魚」，到兒教院時已經破了。聽說學校會發新鞋，我就把它扔掉了。怎知道發來的竟是一雙草鞋，它經常把我的腳刮破，有些傷痕留到現在。兒教院還有校服，上衣是夏威夷款式的童軍衣，帽子、領帶和皮帶也是童軍款式的。褲子則為短褲。除了校服，兒教院還派發內衣褲和幾雙草鞋。這樣我就有一整套衣服了。至於編草鞋，當時機器被那些惡霸同學霸佔了，我們只得用腳趾頭撐著兩條繩來編。用機器編的草鞋質量較好，草繩壓就很結實，我們用手指編的，壓得並不理想。

我們來自五湖四海，最初不熟悉兒教院。那時規矩很嚴格，大清早起床後，要把被子疊整齊，不然就要受罰。然後去河邊洗臉，洗完臉就到操場集隊。集隊時，我們要戴帽子、穿短褲和草鞋，對著司令台集操十五到三十分鐘。那是正式步操，初時我們亂成一團，但過了一段時間就學懂了——立正、正步、跪下，就如軍隊。步操結束後，院主任會上臺報告過去一週的新聞消息。吳菊芳是院長，七間院各有主任。院主任是分院裡職位最高的。這個星期有甚麼新聞，如西西里登陸之類的消息，¹⁴院主任便跟我們報告。集會後，就回課室上課。

我剛進去兒教院時，主任是梁昌熾。一年後，李榮臻接替了梁昌熾的工作。一直到我離開兒教院，李榮臻仍是主任。還有一些類似班主任的人。每個區通常有三個班房，¹⁵其中三區比較特別，有四個班房。每個班房有一個導師、一個主任，即一個七十二人的班房，就有兩個老師日夜駐守。班房一頭一尾各有兩個房間，供導師和主任住宿。其他教務主任是住院的，不住在班房裡，另外還有一個辦公室。班房是一個金字頂的平房，中間分成兩邊，一邊是宿舍，一邊是課室。我們七十二人住在一起。宿舍內每邊有四格，每格分上、下兩層，共八格，床位橫放。我在三區，睡下舖，住得最久也就是這裡了。床舖只有床板，行李擺在上面，就是全部的家當。

我們這群僑童班的孩子全來自香港，導師用廣東話教學。導師的籍貫大概是廣東吧。說到導師，我在二區遇過一位教童軍的女老師，叫彭惠君，她是「男仔頭」。我對三區的記憶比較深刻，記得當時的區主任叫趙淑儀，她的姐姐叫趙韻泉，而我的班主任分別就叫李詠梅和陳解心。

¹⁴ 美國、英國及加拿大盟軍於 1943 年 7 月 9 日晚上登陸西西里，並於 8 月 17 日獲勝。此行動為後來入侵意大利揭開敘幕。

¹⁵ 班房為廣東俗語，指教室。

兒教院的生活比較艱苦，每個人只能吃一碗飯。有很多同學，就如那些「牛王頭」，¹⁶整天被老師打，當年三區的那個頑皮小孩，如今還健在呢。那時他經常去偷鄉民的番薯吃，弄得鄉民前來投訴，結果他就常被老師打雙腳。那些老師很嚴厲，動輒就打，他們也懶得跟你講道理，打了再算吧。因為學童多，大家也挨餓，偷東西後被罰打幾棍。不過我沒有去偷，因為那時還小，沒有膽量。我排隊時，也是排最後一個，經常被人欺負。有一次，司徒美堂來學校參觀，¹⁷給每個同學做了一套新衣服。別人把名字大大地寫在衣服背後，但我沒有，結果在草地上晾乾衣服的時候，就被人偷了。我告訴老師，他叫我到院部拿兩套舊的。結果人人穿新衣服，只有我穿舊衣服。

在同班同學間，我較年幼，但到了三區後，卻獲選為小隊長。我們每個班有兩個中隊，每個中隊有三十六人，每個小隊是十二人，而我獲選為第二中隊第三小隊的隊長。原本隊長不是我，我是後來才獲選上的，也許是我成績好，有責任心吧。雖然我的成績好，但整天還被人欺負，幸好我小隊的同學，沒有欺負我，而且很合作。當時班房分中隊、小隊，目的是方便管理，自己管理自己。小隊有些甚麼事情，有些甚麼要分發就由小隊長負責，這樣也可減少老師的工作量。小隊十二人，中隊三十六人，即一個中隊有三個小隊，而兩個中隊就是一區。這樣的編制，很有系統，就如像軍隊編制一樣。

兒教院的課室，有一塊像衣車檯的大木板，¹⁸兩張凳子和四行桌椅。一張桌子兩個人分，每人有一張有靠背的小凳子。同學上課很安靜，即使七十二人一起上課，我們也能清楚聽到老師的話。那時候，我們上課很聽話，只是肚子實在太餓，才弄點花樣。每天有七節課，上午四節，每節約四十分鐘，中間有小休。我們的教材，由兩位兒教院禮聘的教授編寫。教材分四個年級，其中《我國與世界》是四年級的，《我國民族的過去》是三年級的。四年級只有一本書，厚厚的一本，分為政治、文化、經濟、軍事四科，內容全面涵蓋公民教育。我們主要讀這本書，偶爾也會讀一本中華書局出版的算術書。初時我們讀的教科書比較豐富，但後來越來越少，最後只讀自己編的那本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《我國與世界》，因為那是畢業班時讀的書。這些課本，用完了就要交還學校，留給下一班同學用。那時候的書，非常珍貴。其他科目，如工藝科，要到中學時才學。上音樂課時，老師在黑板寫上簡譜，作為教材，同學自行抄寫。至於體育課，多數安排在下午進行，同學到操場上跳沙池、打天梯鋼架、跑步等。此外，我們每星期上兩節童軍操，形式像軍操，不過沒有甚麼道具。那時我們連籃球和足球

¹⁶ 牛王頭為廣東俗語，指頑皮的小孩。

¹⁷ 司徒美堂，廣東開平人，為著名旅美僑領及中國洪門致公黨創始人，並曾參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。

¹⁸ 衣車為廣東俗語，指縫紉機。

也沒有。

至於書寫工具，用的是竹紙，質地像用來寫大字的玉扣紙。院方每月會派發十五張，我們每張紙要用三次，首先用鉛筆寫，寫完後就用來抄書，抄書後把紙翻轉，再用來練習毛筆字。初時學校會派發鉛筆，後來就沒有了。所謂的抄書筆，就是用來寫小楷的那種細毛筆。當時哥哥從貴陽寄來了二十元，我拿了八毛錢買了一支鉛筆。那時候家裡的錢會寄到學校，由區導師保管，用錢時便去他那裡取。

兒教院的圖書館，是掛名而已。它有學生千多人，圖書館的書與其說是給同學看，不如說是給老師看。讀高年班的時候，我被派去圖書館當值，做一些瑣碎的工作。同學甚少到圖書館借書自學，大多是老師教甚麼就學甚麼。如果老師說老鼠有八隻腳，我們也會相信呢！

每逢週一，院主任會報導新聞和一些特殊事件，如北非大捷、台兒莊大捷等新聞。省主席李漢魂和院長吳菊芳平時在韶關，我們每年大概有一次機會見到他們。他們有時會陪同外國僑領前來參觀，例如司徒美堂來的那次。那次我在三區，看見場面很隆重。我們沒有見過世面，見到汽車，才知道車是沒有聲音的。那輛是美國車，經過身邊，我們也聽不到聲音。為了歡迎司徒美堂，我們不用上課，高年班同學站在公路兩旁，我也站在那裡，一起歡迎他。那天吳菊芳和院主任陪司徒美堂，沒有講話，但後來司徒美堂捐了一些藍斜布和縫製白襯衣的布，給學生做童軍服。但我的新衣，不夠三天就被偷了，這算是我在院裡經歷的大事。

至於兒教院的伙食，我們在最困難的時期，吃過墨豆。它的樣子跟荷蘭豆差不多，只是咖啡色。每頓飯有二十多顆「銀」。¹⁹我們還試過以一磚腐乳來拌飯，不過這些都是特殊情況。一般來說，我們有半盤油鹽水煮白菜。炊事員把一勺油和一勺鹽澆在白菜上，用木盤子盛著。我們會吃米飯，但我曾聽過小道消息，說政府發來的米，每人應該有七兩，但院方扣起七錢，兌換成買菜的錢。依我看，每人原可吃三份飯。我們每天只吃午餐和晚餐，由於吃得不飽，所以有年齡稍大的孩子，晚上便到田裡偷東西吃。此外，逢年過節都會宰一頭豬。那時場面很隆重，好的部分如豬肝，會煮給老師吃，我們每人分得一、兩塊連皮的豬肉，每塊約有兩根手指那麼大。畢竟一頭豬，要供一千人吃，每人只得一點。那時候，有豬肉吃，我們已經很高興。至於端午節、中秋節和新年，都有豬肉吃，記得兒童節也有。因為我個子小，面黃骨瘦，排隊排最後，所以兒教院給我營養餐。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總院或吳菊芳院長的安排呢？

¹⁹ 銀為廣東俗語，指豆粒。

當時我們營房兩邊相通，吃飯時，一般孩子在一邊吃，幾個特別優待的就在另一邊吃。中午飯時，我有幾塊豬肉和幾條芽菜，如是持續了大概一、兩個月。那時天天有肉吃，已經很興奮。雖然吃了一、兩個月營養餐，但我直到二十多歲，仍是很瘦弱，體重只有一百零三磅。

我們小學中年班、低年班的學生，不須幫忙煮飯。三、四區那些高年班要輪流幫忙，每天抽調一個中隊到廚房負責洗米等工作。廚房在一間廟裡，沒有菩薩，我們在裡面煮飯。記得有兩根柱子在廚房門口。那時沒有自來水，所以要拿個籬筐去河邊洗米，非常沉重。每逢星期六下午，我們有兩節勞作課，到學校農地鋤地種番薯或種菜，由勞作老師指導，而農作物會歸公。這不是很複雜的事情，老師叫鋤地，我們就鋤，叫你揀番薯，你拾完便送到院裡。

在兒教院，我病過一次。那時是 1945 年元旦，我快要畢業了。由於發燒，我住在兒教院的醫務所裡，住了幾天。所謂醫務所，只是一間廟，擺放幾張病床而已。醫務所有十來人，其中有一位黃醫官。那裡的藥物，說起來真嚇人。如果是霍亂病，黃醫官就燒些開水，加幾勺石灰，攪拌後給每人倒一杯，叫大家喝。那時沒有霍亂疫苗，只能喝石灰水治霍亂，但不喝也不行，因為是規定的。1945 年，兒教院曾經痢疾肆虐，有一半同學拉肚子，但沒有廁所，只好在小樹旁拉，結果拉得到處都是。那也沒有辦法，當時又沒有藥吃，只得靠自己的抵抗力。那時死的人不是很多，同學的身體挺好的，大家說這是靠平日早會前的操練，跑步十幾分鐘所練回來的。

兒教院強調「家、校、場、營」，那只是美化的說法。「家」指在那裡吃和睡，「校」指在那裡讀書，「場」指在那裡生產，「營」指在那裡接受軍事訓練。兒教院紀律嚴明，如果有同學犯規，最普遍的處置方法就是打藤條，對著大腿、小腿打，打到瘀黑。我也試過一次，不過已忘記原因了。我從來很少被打，只犯過一些小規矩。

兒教院有一個兒童劇團。跟我一起到石馬參加搶救隊的鞏氏兄妹，兄長叫鞏顯鵬，妹妹叫鞏蘇珍，他們也報名參加。劇團挑選了妹妹。學校也有選美活動，我的同學蔡長清，當時獲選為「先生」，意思就是最帥的同學。這些都是學校舉辦的活動，很有娛樂性。那時連縣鵝公潭有一間教會，我們好像借了那裡的禮堂來選美。至於當時的投票方式，我記不起了。蔡長清這個帥哥和我們是「三劍俠」，幾十年來經常見面；另一人梁懿謙，則屬我們中隊第一小隊。印象中，他也選過一次，好像最後沒有甚麼獎。我對這個活動印象挺深，畢竟很少見呢。

說起來，好像不好的回憶挺多。有一次，復員到洲心，我們坐的那艘船走了捷徑。河往那裡彎，我們就走到那裡。後來，天快要黑了，我們的船走得慢，同學的船可能因為順水，走得比我們快很多，已經停在我們幾公里外的地方。他們停船的地方，水深有兩、三尺，由於沒有碼頭，我們只能踏水過去，要走二、三十尺的距離，讓我非常難忘。此外，我曾考過第一名，但事情已經過去了，不大值得說吧。還有一次，我們從忠順坐車到韶關，幾乎被一輛軍車撞下山。因為那些省行車，像一個木箱子，我們在裡面看不到外面。那時有一輛軍車靠山走，而我們則在懸崖那一邊走，突然轟的一聲，我們被撞了一下，車子幾乎掉下那千尺懸崖，非常驚險！

我們在仰掌塘，又遇過驚險事情。那裡離縣城有兩公里遠，河邊有很多蛋家船。²⁰當時經常聽說日本人不夠糧食，會把未淪陷地方的米糧，經水路運給日軍。有一次，仰掌塘的人看到盟軍飛機，說那是美國機，機身有一顆星。那飛機在尋找位置，然後掃射蛋家船，在空中巡邏一圈後，就消失了，但不到幾分鐘，又從很遠的地方低飛過來，用機關槍掃射兩公里以外的地方。從那天起，老師便讓我們搬到另一區上課，即遷到二、三院。因為那裡有大樹林，又沒有河，可以避開盟軍飛機，免被誤傷。經歷了這樣的事情，還能保住性命，實在感恩。

大撤退

1944 年底，日本人攻打韶關。我們從星子出發，經過朝天橋，沒有走公路，而是拐到山去，繞了一個大圈到西江，然後走到連縣縣城。因為我們接近湖南邊境，所以我們也要疏散。疏散的時候，沿途只能走路，沒有乘車。疏散時，我們繼續進行軍事化管理，安排前站隊，即挑選一些比精壯或身輕的同學，由事務主任帶領尋找地方。他們到鄉村找，如發現有空屋，就會用省政府的封條圍封它。疏散不久，我們走著走著，聽說一些幼童班學生落後了，這時一些年紀較大的同學，便背著他們走，互相照應。但也有十個、八個同學落後，跟不上隊伍。我們在田畞上走，這樣便可走直線，而走馬路則要繞圈。聽說有可能會遇到日本人襲擊，也有可能遇到土匪，幸好我們全沒遇上。當時我們會說：「這個大東山經常有老虎出沒，你們要小心啊！」從星子到養長堂，要走三天。前站隊每天晚上去找屋子，走到哪裡就封到哪裡。有次找到一個豬棚，裡面有豬，我們就睡在豬棚上面。途中我們煮飯，記得在疏散後的第一天，我吃了一磚腐乳。那時候沒有什麼東西賣，只能吃腐乳。

²⁰ 蛋家指以船為家的漁民。他們常年舟居，以漁業及運輸為生。

我們在連縣的養長堂搭建了一個大棚，在那裡住了大半年，其間我讀中學。這一次，第一院全院疏散，但實際上的人數，我並不清楚，只知道當時很多同學跟隨主任疏散。那時第一院疏散到不同的地方，我們選在養長堂。那裡的環境跟兒教院完全不同，上課時，把床板掀起來，找個空位置就坐下來。那時候我第一次接觸英文，老師在黑板上寫，我們就把課本豎立在床上，抄一句讀一句——a man and a pen, a man and a pen。我第一次讀英文，就是這幾句了。當時有個老師懂一點英文，平時用英文跟妻子溝通，也有些老師來自香港，所以教教我們英文。

剛到養長堂的時候，升中班也只是四區的那一班，差不多有一百人。原本共有三班，但因為有一些同學未能升讀，所以後來只開一班。我們一、二、三、四院都在廣東的西面，其餘則在廣東的東面。東面的那些往南雄那邊疏散，我們則往廣西那邊疏散。到了那裡以後，共開了四間院，有五百零一個升中學生。記得有兩個病了，所以在考試時有四百九十九個學生。從前我在班裡，多考前三名，但現在幾個院合併一起考，面對的就是四百九十九人了。剛好那時媽媽把弟弟接回連南縣城三江，同學間傳聞有本升學指導，大家你給傳我、我傳給你。這本書不是很貴，可能十來二十個大洋，媽媽便給我錢，我就請別人幫我買了一本。這本升學指導的編者是倪志澄，它對我頗有幫助。小學時，數學科的追及問題、時鐘問題和繁分數，我覺得難度很高。而這一次，考算術時有五道題目，平時考第一的同學，竟然答錯一題，結果排名大跌。而我卻取代了他的位置，考了第一名。當時院主任過來輕撫我的頭，說：「你很醒目。」²¹他還獎勵我們前十名的同學吃一頓飯。他吩咐師傅下廚，煮好了，就讓我們到他家裡吃。十八個人吃了十五斤米，總之你能吃便吃，這頓飯很難忘！

那時我很聽話，知道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可能因為家貧，我已經開始為未來生活籌算。

1945年8月，我們小學畢業了。我是兒教院最後一期的小學畢業生，即升中班學生。那時候剛放暑假，院主任跟我們宣佈和平的消息。大家聽了高興得跳起來。9月時我們仍在上課，但學校已處於半停課狀態。我們再住了幾個月，到了差不多農曆年時，大家就乘船回廣州。我們在出發的前幾天，才收拾行李。如果繼續打仗，我就會升讀力行中學了，因為一般考前幾名的精英，都會挑選去力中讀書。誰知道回到廣州後，教養院就解散了，因為李漢魂下臺、羅卓英上臺了，但羅卓英太太對權位沒有興趣。李漢魂下臺，吳院長當然也要下臺。

²¹ 醒目為廣東俗語，聰明的意思。

1946 年年頭，我們回到廣州。那天剛好是年三十，蛋家人說不工作，但我們說要趕時間。他們便象徵式地從養長堂開船至連縣縣城，大概走了一、兩公里後，又說不再工作，要過年後才開工。這樣，我們便遲了三天才到達清遠洲心。船停後，我們到對面的源潭火車站等政府安排火車。我們有差不多一千人，要兩個空車廂才能夠把全部人送回廣州。記得那火車沒有蓋，像運豬的車。我們很興奮。那時候母親已回東莞。

到了廣州，我們住在河南嶺南大學對面的五鳳村。那裡有幾個軍營，住了一些軍隊，他們空出幾個營房給我們住。那是陸軍第五十四軍一九八師五九二團，即黃耀武的兵團。這兵團的軍隊在山東，沒多久就出發到青島去。我們千多人住在軍營裡，6 月 13 日我就離隊了。那時我想兒教院不久也要解散，連吳菊芳也來軍營跟我們開會道別，交代日後的事務由甚麼人負責。我知道兒教院快要結束，就想早點回鄉。回到家鄉後，知道父親已回到香港工作，我在鄉下住了兩天，便去香港了。

戰後回港

1946 年，我回到香港，沒有繼續讀書。爸爸不主張讀書，認為讀書沒有用。如果他肯讓我讀書，我也可以讀，但他不肯供書教學，我就沒話可說。我自認成績還不錯，但礙於家庭，便跑去學師。但老闆還沒開鋪，錢包已被小偷扒走，鋪開不成了，我又浪費了幾個月時間。

1947 年，爸爸有個朋友的女兒在培道女子中學當會計，介紹我去當校工，一做便兩、三年。那時候培道在士他令道，學校是一間教堂，裡面只有很少班房。1947 年底，培道搬到嘉林邊道，校舍大了很多。1949 年 10 月，我離職了。

我的英文，大多是當校工時學的。那時候在學校工作，有位先生很熱心，說：「下班後，我教你英文吧。」我說不用了，老師五點鐘放學，還要教我讀英文，不成，還是自己去讀吧。於是，我就去了報讀英文夜校。德明中學的夜校叫納民英文夜校，是我讀書時間最長的學校。我在那裡讀了兩年英文。

到香港後，有幾個兒教院的同學經常和我見面，其中有個住在土瓜灣樂民村。我們以前是升中班的同班同學，感情很好，每個星期都會見面。兒教院時，我們被稱為「三劍俠」。其中一個已經去世，只剩下我們兩劍俠。兒教院時期的東西，我只保留了一張小學畢業證書，考第一名的那些文件已經沒有了。至於畢業證書，我曾委托廣州的同學，替我找主任補發一

張。同學找了幾年，到了 1950 年才找到。那張小學證書，至今有六十多年歷史，現在算是國寶了。這幾年來，我有個心願，就是有甚麼我可以捐助的，我必竭盡所能，因為我曾經受到別人的恩惠——無論是上海的那幾年，還是在兒教院的日子。

回望過去，兒教院的歲月對我的影響很大，除了教我要竭盡所能幫助別人，還教會我要有自立的能力，不能依靠別人。不依靠別人，是因為一旦遇上了心腸不好的人，就會被騙。兒教院時，我只有十幾歲，已經覺得要靠自己，而且一定要有學識。儘管窮困，但我對子女教育開支，決不節省。大兒子預科畢業，當了護士。二兒子讀書跟不上，跟我做眼鏡，我把店鋪交他打理。三兒子在英國伯明翰大學讀工管碩士，在入境處當 **officer**，做了二十多年了。他們遠超我的期望，現在我安樂了。



張義祥先生 (2008)



訪談時，張先生展示戰時腳上的傷患



張先生結婚照片